

【教育教学研究】

DOI:10.13467/j.cnki.jbuss.2018.01.21

知识论视域中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

刘璟洁¹,孙慕义²,许启彬³

(1. 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3. 东南大学 党委宣传部,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知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演进轨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知识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把知识看成一种有生命体,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化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将对知识的理解引向其本真,也从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各个知识类别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知识的确认投射于知识的推动力——宗教之上,进而为知识确认可能的定位,使得知识能成为有生命的知识,并与宗教成为一种生态关系。

[关键词]知识论视域;知识与宗教;生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8)01-115-06

伴随着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不仅仅有人类自身,还有知识。从原始的宗教知识,到逻辑严明的哲学知识,乃至到当代“知识大爆炸”的科技知识,知识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历程。可以说,知识论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道历史性的命题。有关知识论的研究甚嚣尘上,逐渐形成有关知识学的知识学,对于知识的起源、知识的客观结果,以及知识的必然性进行哲学的追问。然而,不应忽视的是,知识之谓知识,也有其张狂和暴力的一面。当人类日益沦落为知识的海洋无法自拔,当科学知识越来越取代人类心中神圣一隅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身诘问,知识能否超越人之上并成为主宰人类的力量?知识能解释什么?又不能解释什么?知识是不是万能的?如果不是,知识又如何仰赖他物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事实上,本文的立场就在于,如何从知识本身出发,将知识的确认投射于知识的推动力——宗教之上,进而为知识

确认可能的定位,使得知识能成为有生命的知识,并与宗教成为一种生态关系。

一、从知识到“知识之树”

(一)知识的基本界定

知识与知识论理应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知识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然成为渗透到人类生命深处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从柏拉图的美德、神学家的信仰、培根的力量、福柯的权利,到后现代主义者的统治的演进历程。只不过,这种历史的演进也必然要归结到历史的语境中去。于是,又可以看到,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中,知识成为一种科学,成为一种技术,乃至成为一种信念。因为西方文化中主客两分的特点,使得知识一方面成为异于人自身的客观知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之中,那些对于自然的认识逐渐成为真理,并沉淀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对于人主观的灵魂,也不仅仅交由客观的知识掌

* [收稿日期]2017-06-26

[作者简介]刘璟洁(1980-),女,河南安阳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孙慕义(194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

许启彬(1981-),男,山东泰安人,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管,而是交给了无所不能的上帝来主宰,因此,西方的知识就呈现出与宗教共存的状态。而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并没有西方语境中那样鲜明的知识论传统,甚至在中国的文化中,尽管有“知”也有“识”,所谓“知”也是“知道”,不仅是感知身外之物,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乾知大始”(《易传·系辞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所谓“识”是“转识成智”的“识”,与“知”本质相同,但“知识”这个词本是西方的舶来品,如同“科学”一样,是被引进来的。并且在根本意义上,中国语境中的“知”与“识”与西方的“知识”也是异质的。其一,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知识”的主客二分,而是对天人合一之道的体验和把握。其二,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知识”的逻辑归纳演绎,而侧重对于心之感和内敛的直觉把握。其三,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知识”侧重于宗教化的基础和背景,而是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和生命意识,因而中国的知识与西方的知识是有差距的,并不直接指向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系统。这是我们在界定知识的时候,首先需要澄明的立场。

对于“知识”下定义,是很难把握的。因为作为历史性的范畴,知识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演进轨迹,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知识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我们无意在此罗列历史上的种种定义,而是赞同德鲁克的定义:“知识是改变事物或人的信息——或者通过成为行动的根据,或者通过使个人(或机构)有能力采用不同的和更有效的行动”^{[1](P197)}。把知识定义为信息,就如同知识本身的特性一样,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信息,既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外显知识与内在知识,也包括了古代的信息和现当今的信息。而在信息的进化过程中,同样有两个向度的运动,一是知识不断地吸纳新的信息,使得知识系统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拓展;二是知识不断地将陈旧的信息剔除,使得知识系统伴随时代的潮流。

知识的分类问题也涉及到对于知识的界定。比如,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外显知识与内在知识,而实际上,对于知识的分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也正是对于知识的分类有别,使得知识论作为一门学问,有着丰富的多元性和丰富的内蕴。

本文对于知识的分类,其实没有局限于某一种。但是,就宗教与知识的生态关系,多元化的分类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将知识按照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类,即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编码知识又可分为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的编码知识两类,而想象(如神话、童话)是一类特殊的知识,既可以是可交流的编码知识,也可以是属于个人的隐性知识^[2]。

(二)由葛梯尔问题引出的知识论困境

传统的知识论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向,肇始于“葛梯尔问题”,由此可以投射于新的知识论视域,并引发对于知识论的深度剖析,或再度分离,或重新综合。

在传统的知识论中,对于知识的基础性界定来自古希腊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对于知识的定义。在这一定义中,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确证了的、真实的信念。也就是说,知识是由信念、真与确证这三个要素组成的:(1)命题P是真的,(2)S相信P,(3)S的信念P是确证了的。因此,在传统知识论看来,当且仅当以上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我们才能说“S认识P”。由于这一定义在西方传统知识论中所具有的经典性影响,它也因此被看作是有关命题知识的“传统分析”^{[3](P31)}。

然而1963年,葛梯尔在《分析》杂志第23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确证了的真信念是知识吗?》,用两个反例试图说明把知识看作是确证了的真信念是不正确的,直指传统知识论定义的要害,即在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说,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诸如知识定义的困境、确证的困境,或者怀疑论的困境等种种困境之中。

葛梯尔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传统知识论的信念真假的怀疑,更在于对知识的信念问题本身的关注上。因为就通常意义而言,对于知识的理解,更多地被放置于客观的结果一端,而当有关知识的发生存在的、乃至发展的过程,被抽象为一种外在于信念之外的实在时,知识本身其实就已经开始潜藏着危险,而当异于信念之外的知识开始宰制人之信念之时,知识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因此,由葛梯尔问题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到底应如何去看待知识?另一个便是决定知识的信念到底应该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三)“知识之树”的透视

浩瀚的知识是没有生命的沙漠,还是遵循规律的生命有机体?从表象看,知识有客观的一面,比如,业已形成共识的编码知识;也有主观的一面,诸如存在于头脑中的思维定势或者直觉体验,这是隐性知识。而在表象之外,知识还有更为深刻的本质,这种本质既存在于知识的诞生一维,也存在于知识的历史过程一维。换言之,知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目的性,也有鲜明的历史性。而这种目的性和历史性的归宿即是人。知识从来都是人的知识,为人的诞生而诞生,为人的目的而存在,也为人的目的而消亡。正是由于知识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知识不是像外在于自然物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也是有生命特征的。

把知识看成一种有生命体,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化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将对知识的理解引向其本真,也从一种生态的视角中廓清了各个知识类别之间的关系,因而更能“科学”地理解知识。

而在对知识的生态化诠释中,“知识之树”无疑是经典的。“知识的源泉如同大树的树根,深扎在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体验之中。”^[3]而伴随着知识的演进,非嵌入编码知识使得“人类知识之树终于在条条根须之上生长出了主干。游离于该知识体系之外的属于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由或多或少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以及想象组成,如果不想被抛弃,就必须立足于非嵌入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建。传统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新的生命。”^[3]由此,知识的起源成为“知识之树”的根须,非嵌入编码知识成为“知识之树”的主干,而各个民族的编码知识、隐性知识,以及想象等各类知识成为支干,乃至更小的枝叶……

二、宗教作为一种知识

葛梯尔问题质疑的是知识的确认问题,也是关于知识的信念问题,对于知识的信念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是诉诸于人的内心。由于人的内心信念最本源地来自于宗教,因而宗教作为一种信念,同时作为一种知识,在知识论视域中,不应该也不能够排除其外。相反,宗教之于知识论不仅是知识发生学的基础,也是知识产生的内在信念和外在环境。只不过,这里我们提出的宗教是广义的、抽象的宗教,而不仅仅是哪一个宗教。

(一)从“四大文明”的知识体系看宗教的意义

和界定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期,世界上先后诞生了四大文明圈,而这“四大文明”形成的四大知识体系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显而易见,这“四大文明”的核心都在于宗教,而通过这四大文明投射至今形成的现当代社会中,宗教依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在整个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尽管宗教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四大文明”所诞生的知识系统,之所以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是因为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对人的有限性的确认,即人在自然面前、在客观规律面前乃至在其自身面前都是一种有限的生命存在,宗教的意义在此可以通过超越性的维度来确认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使得人类只能在历史性的知识基础上去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为人的无限性提供的可能,人在有限性面前总有一种冲动力去超越现实去追求无限,宗教为这种超越提供可能。这种可能既来自于宗教提供的超越性的时空界限,又来自于宗教赋予人类的一种精神路径。

在对宗教的本真意义之上,可以对宗教做出基本界定。作为广义的宗教,既可以是信奉或崇拜“神”为本质,又可以是以宗教的社会功能为本质,还可以把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作为本质。而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系统,由不同层次的元素有机地构成:(1)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是宗教系统中的核心或逻辑基础;(2)宗教的感情或体验,是信仰系统的第二层次;(3)宗教的崇拜或活动,是宗教观念及宗教体验的外在表现,处于信仰系统的第三层次;(4)宗教的组织与制度,是宗教观念信条化、宗教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是宗教系统的最外层^[4]。由此可以对宗教做多元化的理解,而并不仅仅是某一方面,宗教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宗教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它能够赋予意义并解释知识本身。

(二)宗教在知识论视域中的历史与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应该比知识更为古老。因为,一方面,宗教是知识的起源之一,另一方面,宗教所信奉的神圣也先在于知识;并且,宗教比知识更加具有历史和逻辑的脉络。如果说,对于知

识演进的历程需要提炼、梳理的话,那么,对于宗教而言,则是自明的。比如,基督教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其基本教义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在此,对宗教的历史和逻辑做一简单梳理,更有利于深刻理解宗教本身。

总体而言,宗教从起源到现在的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 原始宗教阶段。由于人的文明状态尚未开化,人面临着与自然的直接对立,因而,对于不可理解的自然就有了一种恐惧或者敬畏。而在这种情感体验之中,以巫术为主要形式的原始宗教就逐渐形成了。作为一种应对自然的虚幻尝试,巫术是通过早期人类心中自然两分的世界,即最初的世俗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交感作用而实现某种目的的活动。巫术本身在知识形态上是混沌的特征。由于巫术天然的实践目的性质,使得巫术既是一种隐性知识的开端,也成为一种科学知识产生的源泉。比如,从驱病赶鬼的巫术产生了医学,从占星巫术中产生了天文学等等。

2. 宗教诞生到基督教宗教改革阶段。在人类文明继续进化的过程中,宗教的作用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成为一种主导。这在从各大宗教诞生到基督教宗教改革阶段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于神灵的把握趋于自觉,并且面对的不仅仅是直接的自然,还有宗教化的社会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方基督教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在整个中世纪,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神学体系,一切知识都是围绕《圣经》展开的,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而近代科学知识,在这个阶段是被压抑的。尽管如此,西方科学知识仍然有着潜在的动力,而最初抗拒基督教知识体系的正是教会大学内部。真正打破基督教知识枷锁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尤其是宗教改革,使得宗教走下神坛,开始世俗化。与此同时,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喷薄而出,开始崭新的发展阶段,甚至到如今科学、知识至上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很显然,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非嵌入编码知识也开始超越隐性知识而成为知识的主体。

3. 从宗教改革到当代阶段。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的社会形式逐渐趋于瓦解,“上帝”逐渐被请到人们的心中,因而在此后的宗教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科学知识开始统治现代社会的情况下,宗教越来越趋于无形,人类开始面临着人与自身灵

魂的关系,信仰也成为个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发展历程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宗教重新归于隐性,那些神学知识体系也不再风光;另一方面,知识开始大爆炸,以“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为标识的知识时代,将“上帝”驱逐以后,开始渐渐步入神坛。然而,这种置换也隐藏了危险,知识大爆炸不仅仅炸出了极大丰富的知识,也炸走了知识的发展动力和方向,并使得编码知识、隐性知识等各类知识的边界消融,出现一种新的混沌状态。

(三)宗教作为一种知识

宗教作为一种知识,有三个层面:

1. 宗教中包含有编码知识。由于宗教和知识的诞生,其实都根源于人类的实践,因而两者在人类实践过程中有着相通的形态。具体而言,基督教的《圣经》,不仅描写犹太人的历史,还有诸如医学等各种各样的知识。《圣经》中包含着所谓密码,也隐喻着神秘的知识。比如,对于数字三而言,三似乎涉及到宇宙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与物理学上黑洞学说有关联,而且对于混沌学亦有重大的意义。这与中国道教始祖老子的三能衍生万物颇有巧合之处,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在佛教的知识论中,侧重于自明性的唯识学理论,成为其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内容,以因明论式来进行推理得出新的知识或者进行辩论,由此成为佛教知识体系中的推理形式。而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含有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经文对积雨云的描述。

2. 宗教包含隐性知识,可以作为更高级的预设和“公理”。宗教不仅仅含有编码知识,更含有隐性知识,这是单纯的知识形态所不能比拟的,而正是这种高于单纯知识的优势,使得宗教可以成为更高级的预设和“公理”。这种高级性使得知识与宗教的边界得以澄清,宗教是更高的知识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能够解释第一推动力推动之后的一切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这个第一推动力本身,因而牛顿最后回归宗教中去。康德虽然精通十八世纪科学,并先于拉普拉斯提出早期太阳系诸行星形成的星云假说,但是,他认为,科学方法具有局限性,这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尽管良心和道德在知识解释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但是,康德最后还是请回了上帝。他坚持认为,上帝是第一因,上帝才是知识和道德的预设和高级公理。柏特对此评价说:“宗教的任务是启发我们的道德奉献精神使之具有宇宙论的庄严”。

3. 宗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最高信念和精神。在上文,我们提及葛梯尔问题时的追问,就是决定知识的最高信念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的答案就是宗教。一般而言,每个人的知识体系都仰赖于这个人的信念,这其中包含着对于知识认识的价值观的持有,因而,在不同的信念之间也就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了。尽管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真理性,但是,对于编码知识之外的知识如何通约,在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下,宗教的信念可以让知识成为公共的知识,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宗教也是一种最高的信念和精神力量。因而人作为目的,以及对于同一个自然乃至宇宙的理解,都是大同小异的,故存在着相互通约的可能。一旦宗教的引导力化成信念,就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意义的推动力。比如,《古兰经》就有:“真主引导谁,谁就是遵循正道的。”这种宗教的引导力将信念化成一种共识,并体现为一种献身、奉献的崇高精神。而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使得宗教和知识一样,具有了生态化的生命力。实际上,宗教的生态性比知识来得更为彻底。

三、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

对知识和宗教在共通的平台上做出基本的界定之后,有必要对于二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梳理。如题所示,本文将知识与宗教定位为一种生态关系,亦即知识与宗教共同存在、内嵌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态圈之中。将知识与宗教做生态化的关系诠释,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也是一种范式的更迭。

(一)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描述

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是以“知识之树”为轴心的。“知识之树”将各种知识生命化地融合为一个生态圈,不仅体现了各自的关系,也彰显了知识的演进历程。结合“知识之树”,我们诠释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为:(1)在“知识之树”的萌芽之初,宗教是知识的源泉之一,亦即是“知识之树”的主根之一。因为,宗教正是早期文明的人类,在面对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实践和认识的初步结果。这种形式更多地是以虚幻的、隐性的知识表现出来。由此,宗教可以看作是知识的原初推动力。(2)在

“知识之树”萌芽之后,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细小的主干。这里的细小,主要是相对于庞大的神学体系而言的。宗教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压制,使得“知识之树”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生长缓慢。(3)在“知识之树”迅速成长后,亦即近代科学兴起后,非嵌入编码知识开始成为主干,而宗教被驱逐,只能是化身为枝叶,在特定的民族文化那里重新获得生命。(4)当“知识之树”在当代疯长并失去方向之后,宗教再次被请出来,只不过,宗教回到更高的位置,像一个太阳,既给“知识之树”照亮方向,引导其合乎规律的成长,又提供着推动力,并且给“知识之树”以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

(二)知识与宗教何以是一种生态关系

知识与宗教之间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和宗教都是“属人”的,都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只不过知识是作为工具,而宗教作为终极的目的,两者共同构成一个目的论的范式。另一方面,知识和宗教都处于同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之中,相互交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归根结底并不冲突。此外,知识和宗教是互补的,其互补性是由丹麦科学家玻尔提出的。他认为,像波动性和粒子性这样的关于微观粒子的两种解释模型,它们是互相排斥、不能同时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模型,都不能向人们提供一个关于微观粒子的完整描述。正如玻尔所说:“把同一对象完全阐述清楚可能需要多种多样的观点,其结果是不再有独一无二的解释。”^{[5](P366)}因此,这就需要一种双重描述,互为解释,知识需要宗教的养育和引导,宗教需要知识的填充和论证。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则是盲目的。”

(三)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的意义

1. 消除知识至上、科学至上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知识大爆炸使得当代社会步入信息化时代,人类的实践和精神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所控制、包围,以至于异化成奴役人类的力量。一方面,使得人类盲目地追求科学,迷信知识,以致使宗教、哲学、伦理等失去了该有的地盘。另一方面,知识并不是万能的,知识的大爆炸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如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伦理困扰。再如,知识引导下的社会经济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因此,必须将知识和宗教重新纳入一个生

态圈,这样能够消除知识至上、科学至上的负面影响。

2. 让宗教重新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宗教在被知识驱逐之后,尤其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逐渐化为无形,失去了信仰的地盘。但是,这种失去信仰的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类自诞生之时起,宗教就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是人类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终极矛盾的体现。因而,只要人类存在,宗教便不会消亡,如同知识对于人类的作用一样,都是人的生存、生活方式之一。美国作为知识最为丰富、科学最为发达的国度,宗教生活也是最为鲜明的,说明只有在知识和宗教互补、内嵌为生命一体的地方,社会发达才具备可能性。在中国,伦理道德在调节生命秩序的意义上与宗教具有一致性。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宗教,都不可或缺,把知识和宗教作为生态关系去理解,有利于宗教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对于中国而言,可以更好地起到对宗教的“解蔽”作用^[6]。

3. 有利于解决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回到文中提及的两个追问,至此,我们便可得出初步的解

答,一个是知识的基本界定,一个便是宗教作为决定知识的最高信念。由葛梯尔问题引发的知识论悖论和困境,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将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作为视角,试图去解决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尽管我们是在前人“知识之树”的假设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不仅仅是一种补益,更是一种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彼得·德鲁克. 新现实[M]. 东方编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1.
- [2] 吕乃基. 论知识的演进历程[J]. 科技导报, 2003(07):16-17.
- [3] 陈嘉明. 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钱时惕. 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美]伊安·巴伯. 科学与宗教[M]. 阮炜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 [6] 马来平. 默顿命题的理论贡献——兼论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性[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11):107.

(责任编辑 周民)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Religion in the View of Knowledge Theory

LIU Jing-jie¹, SUN Mu-yi², XU Qi-bin³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Jiangsu;

3. Department of Party Propaganda,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Jiangsu)

Abstract: Knowledg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ck,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is also differ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o regard knowledge as a living body is actually a kind of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not only makes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ead to its authenticity, but also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ategory of knowledge. If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is projected on the impetus of knowledge—religion, and then identifies the possible positioning of knowledge, so that knowledge can become a living knowledge, and become an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religion.

Key words: the view of knowledge theory; knowledge and religion; ecological relationship